

进一步加强拉丁美洲史研究

——纪念中国拉美史学科创建40周年

曾昭耀

在告别20世纪、迎接21世纪之际,我们迎来了中国拉美史学科创建40周年。

40年前的1960年,在第三世界崛起、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和工业化运动如火如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的拉美史学科和拉美史专业。继北京大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历史系也相继开设了拉美史课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师范学院还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尽管后来这一学科很快就遭到10年“文革”的严重摧残,但一批有民族责任感的学者,坚守阵地,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默默无闻地做着学科的建设工作。“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人民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拉美史研究的春天,拉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拉美史论著,翻译出版了世界上最新的拉美研究成果(特别是《剑桥拉丁美洲史》),培养出了一批虽数量不多但却很有希望的拉美史研究新秀。但是,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供求规律对历史学的负面影响,由于世界史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越来越向发达国家转移,我国拉美史学科的研究阵地和教学阵地似有日渐萎缩的趋势:拉美史学科的两位开拓者李春辉教授和罗荣渠教授已先后辞世;“文革”前建立的一些拉美史研究机构尽管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都恢

复起来,并一度出现兴旺发达的可喜局面,但现在已明显萎缩,有的甚至名存实亡;随着老一辈研究人员的退休,研究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我国高校能够开设拉美史课程的历史系本来就不多,但就是在这不多的几个历史系中,拉美史课程也越来越不受重视。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应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把拉美史研究提高到其应有的重要位置上来。

—

在世界史研究中,历来都存在着一种并不难理解的现象,这就是研究的热点是由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决定的,是随着研究对象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世界上,拉美史的研究明显地已从60~70年代第三世界崛起的高峰期进入到了90年代所谓“第三世界消失论”时有流传的相对低潮期。近年来我国拉美史研究日渐不景气的现象,显然也是这种带有普遍性学术趋势的一种反映。但对这种学术趋势我们还应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要分析第三世界的作用和地位是不是下降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战略地位与60、70年代相比,是明显地下降了。这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内部出现了分化;过去曾经发挥

过重要作用的一些第三世界国际组织一时对如何调整自己的战略出现了一些分歧;拉美有些大国(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甚至还公开提出退出不结盟国家组织,宣布自己不属于第三世界,等等。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从长远看,第三世界的历史作用和战略地位在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之后,必然会日益增强,而不是降低。这是因为,过去世世代代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广大的殖民地附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中争得独立,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崛起为第三世界之后,它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致力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及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而奋斗。因此,和平与发展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两大主题。在这个时代,第三世界国家及其广大人民是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两项全球性伟大事业的主体力量,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世界上确有那么一股力量,想要历史倒退,想把第三世界国家重新变成它们的殖民地附属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虽然会有曲折,但不可能倒退,第三世界国家必然会在战后崛起的基础上奋勇前进,继续改造这个世界的不合理的秩序,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发展的目标和和平的目标,从而在平等、互利和合作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世界的一体化,实现全球大同的理想。所以,在当今的时代,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文章,是人类压倒一切的历史使命,而做好这两大主题文章的历史使命自然首先要落到第三世界国家广大人民的肩上;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对所谓“低潮期”这个问题也应该作具体的分析。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这个大的棋盘上,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来说,战略重点总是存在的,在不同情况下发生战略重点的变化也是正常的。因此,在史学研究力量

的分布上,有主次轻重之分属正常情况。目前,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起主导作用的、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最大的是西方的几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中国家把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些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所谓拉美史研究已经进入“低潮期”的说法则是不很准确的,是有片面性的。如果我们打开世界最大的亚马孙网络书店的网页,了解一下近十几年来有关拉美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就不难发现,所谓拉美史研究处于“低潮期”,只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一种现象,而在发达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拉美史的研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当然,书店的书目,由于市场流动的缘故,是不可能很准确的,但对我们了解一个大致的情况和趋势还是有用的。据这个书店的书目显示,有关美国史的图书和有关拉美史的图书都是 32 000 种,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有关拉美史的图书中,墨西哥史图书 6 042 种,巴西史图书 2 159 种,阿根廷史图书 1 911 种,智利史图书近 500 种,等等。同拥有近 13 亿人口的中国的拉美史研究情况相比,这些数字的确是惊人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图书几乎全是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成果;整个国际图书市场基本上都被美国所垄断。也就是说,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所传播的拉美史知识中,拉美国家的历史并不是由拉美国国家自己的史学家来解释的,而基本上是由美国人解释的。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是同发展中国家日益迫切的发展要求不相称的,它正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差距。难怪中国的史学家发出了“时代呼唤第三世界史学的勃兴”的呼声。面对这种发人深省的呼声,中国的拉美史学界应该感到责任重大,应该改变“研究低潮”这种不符合

参见马克圭:《时代呼唤第三世界史学的勃兴》,光明日报,2000年3月17日。

时代要求的局面。

二

在拉美问题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历史研究同现状研究的关系问题。按市场经济价值观来看,史学问题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显然比不上现实问题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是当前拉美史研究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这一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市场经济的客观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对史学的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的。一般来说,史学研究的成果并不具有普通商品所具有的那种实际使用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像普通商品那样能够占有广阔的商品市场,甚至在图书市场上也难有一席之地。所以,一个史学工作者要想靠自己的专业去商海拼搏,是难有好日子过的。这就是为什么史学研究这个“行业”日益萎缩的重要原因,也是史学前辈为什么总是教育史学工作者要有“坐冷板凳精神”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史学研究成果既然不同于一般商品,也就不能以一般商品的价值规律来看待和衡量其价值。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人类将走向何方?人类的命运会不会比风云激荡的20世纪更好些?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和平与发展的伟大理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运用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世界的现状和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世界的历史,是没有别的捷径可走的;人类只能通过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研究,来认识现状和预测未来,探索通向理想之路。历史科学之所以重要,原因盖在于此。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得特别透彻,他们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知识决不只是一般的重要,它还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历史的研究。邓小

平同志在谈到开放的重要性时还特别指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对历史研究(包括拉美史研究)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还缺乏一种完善的、特殊的鼓励政策,没有能将这种高度重视落到实处。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历史研究同现状研究的关系问题上,市场价值观尽管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起码忽视了三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第一,现实问题研究属于应用研究,史学研究属于基础研究;市场价值观完全是从史学作品的短期战术作用来看问题的,而没有看到作为基础研究的史学研究的长期的战略作用。若就史学的长期的战略作用来看,则应用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基础研究的深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经典性的例子是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是研究法国现实问题的一部名著,是马克思紧接着1851年12月2日事变发生之后于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写就的一部著作。恩格斯称这部著作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透彻的洞察,而且后来的“每一次新的揭露”都证明了他的这种洞察的准确性和深刻性。恩格斯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深知法国历史”,因为他通晓“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因而能深刻地揭示出“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这说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常常出现因对事态的历史联系不清楚而不能对事态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或预测的情况。譬如对当前最大的三个现实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和全球化问题,就是这样。关于和平问题,现在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和平的时代,笔者认为这很难从历史上得到证明;如果和平问题真的已经解决,人类真的已经进入了和平的时代,那么和平问题就不成为时代的主题了。虽然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直接烧到拉丁美洲这块土地上,但是战争的征兆其实都最早出现于拉丁美洲地区。譬如,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就发生在拉丁美洲;80年代以来霸权主义国家在拉美进行的新干涉主义战争(1982年的阿-英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战争,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战争)也预示着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时有发生当代战争的新形式。关于发展问题,前一段时间对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赞扬者颇多,主要原因多半是人们对19世纪下半叶拉美的头一次自由主义改革的历史缺乏研究和了解,对现在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缺乏应有的预测能力。现在,在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之后,就连华盛顿的一帮新自由主义决策人也不能不承认,“华盛顿共识”没有达到它当初所设想的目的。关于全球化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过去之所以对“全球化运动”赞扬颇多,多半也是由于对“全球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历史教训研究不够。时至今日,全球化的批评者越来越多,甚至连一批国际经济的高层决策人也不得不听取全球化批评者的意见,承认他们对全球化的批评是“有效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很多现实问题都很难说得清楚,更不用说作出正确的决策了。

第二,拉美史研究不仅对深刻认识拉美现实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拉美史研究本

身也是现实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因为史学研究的成果并不只是个别从故纸堆讨生活的人同现实不沾边的一些随便议论,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变化的最集中的反映,是一种折射出来的、让人看得更清楚的现实。譬如90年代初期发生在墨西哥的关于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论战,就反映了墨西哥政治、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的变化及其由此而引起的斗争。又譬如,1998年美西战争100周年前后美国史学界关于美西战争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美化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史学“修正”思潮,就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主义的膨胀。这些情况难道不是值得注意的现实问题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不同阶级代言人所解释的历史。因此,历史学也是研究当代现实问题所不能不注意的。

第三,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还有一点是人们所没有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拉美史研究同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素质的关系问题。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当然不能只是释放科技能量,增加国民经济中高科技的含量,而且还必须同时释放历史学的能量,增加经济管理人员的历史知识,提高经济界人士的全面素质。在拉美一些有关发展中拉经贸关系的论著中,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认为,现在发展中拉经贸关系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双方相互了解不够。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克服这个困难,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毫无疑问就必须要加强拉美史的研究和教育。为此,我们就必须在大学普遍开设拉美史课程,加强拉美史学科的建设。为了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素质,不但我国的经济设计师需要有历史的智慧,而且我国的商人也必须有历史的智慧。

三

加强拉美史的研究,提高拉美史学科和专业的水平,对于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有

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史学界正在讨论历史学性质的问题,即包含有价值判断的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如果还是科学,那么如何控制价值判断才能使历史成为科学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国史学界是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只不过当时叫做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问题。当时所达成的共识是,革命性代表先进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自然是同科学性不矛盾的。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在又重提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在拉丁美洲,就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来看,学者们并不回避历史学的价值判断,争论的只是价值判断的正确与否。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有一件事使笔者深有感触,在讨论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时,很少有人想到要历史主义地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历史观的高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一些拉美的同行却这样做了,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非历史、非社会化的理论”。所谓“非历史”,即指新自由主义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历史的终结”,否定历史的发展。所谓“非社会化”,即指新自由主义主张清一色的私有化,主张摧毁一切集体经济制度。拉美同行的看法显然很有深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这说明,深入研究拉美史,是有助于我国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拉美史研究又有了惊人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以墨西哥史为例,据有关资料介绍,2000年4月出版的《不可避免的伙伴关系:美墨关系研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分析福克斯竞选胜利及其未来政策所必需的背景材料,是观察以后墨西哥政策和了解美国回应福克斯政策的入门书;2000年4月出版的《玛雅大旱:水、生命和死亡》一书,力图破解公元8世纪至10世纪之间玛雅文明消失

之谜,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是干旱的气候造成了玛雅文明的消失,被评论界视为关于玛雅帝国灭亡的惊人理论,“给了北美人类学编年史的这个一直朦胧不清的、甚至造成分裂的黑洞般的问题以一个结论性的答案”;2000年1月出版的《希特勒和罗斯福之间的墨西哥:卡德纳斯时期(1934~1940)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一书,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对卡德纳斯主义作了富有挑战性的新的解释,是在有关卡德纳斯政府外交关系研究方面对“后修正主义”史学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等等。只此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拉美史研究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是一个小差距。如果不急起努力,我们不但不能建立起我国独立自主的拉美史学体系,甚至也不能对我国世界通史的发展和建设作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贡献。

以上从第三世界的历史地位和拉美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同现状研究的关系以及拉美史研究同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谈了进一步加强拉美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展望21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严重挑战,我们深深感到,加强拉美史研究对应对这些严重的挑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拉美史研究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中国拉美史学科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的成长过程,尽管取得不少的成就,但昨日的成就毕竟已铸成历史,不能填补今日的不足,只有继承李春辉和罗荣渠两位教授所开拓的事业,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超越,不断开创拉美史研究事业的新局面,才是我们纪念拉美史学科创建40周年的最好行动。

(责任编辑 蔡同昌)